



吕进 主编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七月派诗歌研究

张传敏等 著



人民出版社

七月派诗歌研究

张传敏 孟利娟 祁宏超 曹付剑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陈晓燕
责任编辑:陈晓燕 岳改苓
封面设计:九 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月派诗歌研究/张传敏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吕进主编)
ISBN 978-7-01-015957-7

I. ①七… II. ①张… III. ①“七月”诗派—文学研究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9987 号

七月派诗歌研究

QIYUEPAI SHIGE YANJIU

张传敏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1.5

字数:195 千字

ISBN 978-7-01-015957-7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吕 进

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初期的现代诗学致力于爆破。现在回顾，这种爆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没有爆破就难以拓出新路。然而这种爆破又是简单与粗放的，连同我们民族的传统诗学精华也成了爆破对象。这就给现代诗学留下了“先天不足”“漂移不定”“名不正言不顺”的缺陷。

百年来，现代诗学在艰难摸索中也有所建树，朱光潜和艾青的《诗论》至今为人关注，闻一多的一些见解至今也具有影响。在 20 世纪的新时期，出现了专业的诗评家队伍，他们成为力求建立属于新诗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主力军。由于没有在现代性地处理与传统诗学的承接、本土性地处理与西方诗学的借鉴上取得突破，现代诗学迄今仍缺乏严谨的学理性与体系性，这就使得新诗迄今仍缺乏诗美标准和文体规范。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诗走向“私语化”，大多数诗评家随之失语，诗人自己的随感式言说和圈子内自道部分地替代了学术话语。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至今依然立足未稳，新诗文体的合法性依然饱受质疑。有些知名诗人和学者公开表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艺术实验。有些知名政治家说，给他一百大洋，他也不看新诗。更多的知名新诗人，到了晚年都“勒马回缰写旧诗”去了。

近年写作旧体诗成为热潮，新诗进一步处于尴尬境地。新文学中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在现代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唯独新诗的读者却几乎与新诗的写作者复合，新诗成为游离于时代、游离于社会生活、游离于学校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无人赏，自鼓掌”的边缘文体。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也必然应该是现代诗坛的主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里讲得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旧体诗迄今依然有其生命力，以后也不会失去生命力，但是作为古汉语的诗歌，旧体诗用于抒写现代人的情愫在形式上会受到诸多局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音词难以入诗；旧体诗的许多形式规范也只是古汉语的结晶。我们读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古诗词就可以发现，译者其实是放弃了古诗词的种种形式要素，将中国古诗词译成了中国新诗。

但是古诗所创造的中国诗歌传统，新诗却是必须继承的，它是中国诗歌的“身份证”。当然，这种继承是经过现代化过滤之后的继承，必须回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况，力求“旁观见审”，有所“健忘”。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讲过：“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省却了不少心力。”

绝对不能赋予诗的“现代形态”以超出诗的边界的权利。既然是诗，就得拥有诗的基本审美规范；既然是中国诗，就得遗传中国诗的审美密码。只有在变革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新诗，才有可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接纳和欢迎。

近年来，诗坛上有的“理论家”频频宣传新诗就是“自由”的文体，宣传忽略甚至放弃诗之为诗的文体要素，宣传忽视甚至放弃诗的文体可能，进一步将新诗推向困惑和无序的境地。什么“新诗就新在自由”“凡大众欢迎的就不是诗”，这类腔调实在应该偃旗息鼓了。

新诗需要生根，新诗需要发展，新诗需要繁荣，新诗需要像唐诗那样得到全民族的认可和喜爱。我们急需现代诗学，急需民族、现代、学理的现代诗学。加强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现代性承传，加强现代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本土性借鉴，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完整体系，是新诗的中国梦。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6月，迄今已经30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专业的新诗研究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30年来，研究所在诗学界独树一帜，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出影响，是国内外人所共知的现代诗学圣地。新诗研究所同仁在现代诗学本体论、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新诗发展史、歌词研究和新诗评论诸方面多向度地

展开研究工作，取得人所共知的成绩。

作为重庆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笔者担任主任的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9月，迄今也已15年。中心下设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蒋登科、熊辉先后担任所长）、中国古诗研究所（所长刘明华）、比较诗学研究所（所长陈本益）和中国现代诗学典藏中心（主任李怡），而中国新诗研究所一直是诗学研究中心的基础和旗舰。

诚然，由于地域的原因，新诗研究所在全国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人们习惯性地更注意北京这种“中心地带”的声音，重庆一些文学新作的研讨会也要特地搬到北京举办，这种费时费力而又无效的做法就是“崇北”心理的典型反映。但是学术思想最终并不会以地域来划分正误，也不会以地域来衡评分量，这一点，以后将会由现代诗学的历史来证明，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想起苏联时期的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这所大学地处爱沙尼亚，原来是一所偏僻地区的无名大学。后来那里出了新审美学派，出了新审美学派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斯托洛维奇，塔尔图大学由此成为苏联在美学研究领域一所举足轻重的学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的创意出自中国新诗研究所熊辉所长、向天渊副所长和所务委员会团队，这是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一项纪念活动。丛书得以顺利问世，西南大学和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也是必要前提，谨在此致谢。

“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也是一个诗歌大国。这个古国和大国的诗歌传统，如果在新诗这里中断，我们将愧对后人。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有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借用一下：不管世事怎么变幻，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已届而立之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任重而道远，我愿意最衷心地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序 言

1937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周刊在上海抗战的炮火中创刊了，这一草草创办的文学期刊标志着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的初步形成。此后经过数年的发展，七月派成为40年代在国统区较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之一，他们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七月派基本是和“反革命集团”画等号的，它的命运也只能是接受批判而已。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逐渐变化，学界对于七月派的研究才逐步走上理性的道路并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周燕芬的《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都可谓其中的代表作。时至今日，大量七月派研究材料被不断发掘，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七月派已经成为学界长盛不衰的热门研究课题之一。

七月派反对重视“主观战斗精神”，反对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是一个具有强烈“诗性”的流派。无论在七月派的创作中还是在七月派研究成果中，诗都是最重要的内容。艾青、田间、阿垅、绿原、鲁藜、冀沅、芦甸、庄涌、曾卓、化铁、孙铤、牛汉、杜谷、罗洛、侯唯动、胡征、彭燕郊、郑思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聚集在胡风的周围，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作，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他们不仅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力量，而且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学术焦点。刘扬烈的《诗神·炼狱·白色花——七月诗派论稿》，钱志富的《七月派诗人论》《诗心与现实的强力结合——七月诗派研究》，张业松主编的《待读惊天动地诗：复旦师生论七月派作家》都从不同的侧面对七月诗派进行了描述与分析。

以往的七月派诗歌研究虽然繁荣，但仍有不足之处：无论是描述还是分析，对于七月派的研究大多还是粗线条的、稍显表面化的。学界对七月派诗

歌的理论、风格既然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观点——比如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品格，等等。研究者们所做的主要也就是围绕着这些既成观点展开分析与论述，以使其显得更加丰富、充盈而已。七月派诗歌研究亟待着突破——既包括材料层面的，也包括视角、方法层面的。

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可以说是寻求“突破”的一种尝试。从研究视角来看，本书采取的是散点透视的角度：在“七月派诗歌”这个名目下，作者们并不力求各自研究内容、形式方面的统一性与连续性，而是完全按照个人兴趣决定研究的子题目。

从应用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本书各部分之间也不一致。有针对诗歌文本进行细致解读的文学内部研究，也有对七月派诗人诗作的“知人论世”的文学外部研究；有对七月派诗歌关键词的分析，也有着重对七月派刊物理论、创作特色的概括与归纳。种种不同的内容、方法虽然使得本书结构看起来不那么紧凑，但是可以保证研究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也保证了研究应有的深度。

从研究材料来说，本书尽可能使用最原始的书报、刊物。这不仅可以增强本书研究的可信度，而且其中对某些刊物的发掘与梳理，对以后的七月派研究者来说也足资借鉴。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对七月派诗歌刊物进行研究是本书的重头戏，除了《希望》《诗垦地》之外，还包括研究《七月》的专章。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章并没有完成，这里只能遗憾地宣告暂付阙如了。希望在以后修订的时候能够补上这一部分，以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完整、系统。

张传敏

2016年2月27日

目 录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001

序 言 001

七月派经典诗人诗作重读 001

一、爱的混乱与救赎——艾青《火把》重读 001

二、论田间的“南方诗” 009

重要的是“爱”——论曾卓诗歌中爱的抒写 036

一、曾卓研究综述 036

二、多情的青春（1936—1947） 041

三、在爱中涅槃（1956—1976） 054

四、爱的沉淀与升华（1977—2002） 067

五、爱——曾卓为人为文的总原则 078

时间·生命·梦——《希望》诗歌的三个关键词 084

一、《希望》研究综述 084

二、《希望》及其诗歌的概貌 088

三、《希望》诗歌中的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 095

四、理想的花朵：《希望》诗歌中的“梦”意象 110

《诗垦地》研究 119

一、《诗垦地》的始末 121

二、《诗垦地》的文学实践 130

三、《诗垦地》诗人群与“七月派”的关系·····	154
后 记 ·····	169
丛书后记 ·····	170

七月派经典诗人诗作重读

一、爱的混乱与救赎——艾青《火把》重读

(一)

虽然艾青的《火把》并不像他的《北方》《乞丐》《手推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那样出名，但它仍然是学者研究艾青诗歌（尤其是其中的“太阳”或“火”的意象）时不可忽略的重要诗篇。

“火把”既是该诗的题目，也是最鲜明的意象，与光明、斗争及伴生的集体主义、民主等时代话语非常吻合，于是它的种种喻义也就成为对这首诗主题最常见的理解与表达。艾青在1940年回答壁岩对《火把》的批评时曾交代：他写这首诗，是因为被一次群众火炬游行所感动。当时他似乎全身被“一种东西……一种完全新的东西……”所袭击，而这种“东西”就是“群众的行动所发挥出来的集体的力量，群众本身所富有的民主的精神，群众的不可抵御的革命精神”。他对该诗主题的界说由此产生：

《火把》，这个千行长诗，歌颂的就是这种正在无限止地扩张着的“力量”和“精神”。

《火把》歌颂的是光明；

《火把》写的是全民族争取光明的热情和意志；

《火把》写的是“火的世界，光的世界”；

《火把》写的是光明如何把黑暗驱赶到遥远的荒郊的故事；

《火把》写的是照着我们前进的“火把”。^①

^① 艾青：《关于〈火把〉——答壁岩先生的批评（上）》，《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此后的研究者在阐释《火把》时大都采用或基本沿袭了艾青的这种说法。例如，朱自清就将该诗和艾青的另一首《向太阳》作为“大众的发现”^①的抗战诗歌代表作。所谓“大众的发现”，其实不过是集体主义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已。

这样来理解《火把》当然毫无问题。然而，如果太过强调这个主题以及它对这首诗的意蕴的统摄性，那么贯穿这首诗始终的爱情叙事就很容易被忽略，或者仅仅被当作表达、深化诗歌主题的一种手段：唐尼的爱情是一种不符合集体主义时代要求的“个人小天地”的情感，她应该从中摆脱出来走向光明，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这似乎就成了爱情叙事在这首诗中的所有意义和价值。

不可否认，《火把》中的唐尼及其爱情确实是处于附属地位的、被批判的对象。长诗第一节“邀”一开始就对唐尼参加火把游行前拖拖拉拉的做派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摹。无论是对她在出门前对自己的头发、衣服的格外关注，还是她对同伴李茵叙述看见淹死的伤兵时表现出来的淡漠，以及对她夹在《静静的顿河》里的梳子、压在《大众哲学》上的粉盒、和《论新阶段》躺在一起的口红、放在她哥哥照片旁边的鞋拔等细节的描写，都包含着作者对她的批评态度。

长诗接下来着力表现了唐尼在集体之中的隔膜与恐惧。在艾青的笔下，女主人公不仅对那些手像木榔头、满脸煤灰的工人和“个个都那么呆”的学生表现出轻视与嘲讽，同时还对这些象征着集体主义力量的人们感到“害怕”：

他们都已在兴奋里变成癫狂
每个人都激动了 全身的血在沸腾
李茵 刚才火把照着你狂叫着的嘴
我真害怕 好象这世界马上要爆开似的
好象一切都将摧毁 连摧毁者自己也摧毁

从上述艾青对于唐尼的行动及心理的描写其实已经可以推断：她的爱情是不会被认同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它在诗中被描述为一种“妨碍工作”

^① 朱自清：《抗战与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7页。

的、无聊的恋爱——唐尼在会场上急切地寻找男主人公克明并要他解释为什么人回复自己的信，然而她在信里面不过是说自己“有点头痛”“讨厌这天气”等个人生活琐事，而克明则正在忙着筹备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艾青还在第十五节“劝二”中借李茵之口更明确地指出，唐尼的爱情对积极参加抗战工作的克明来说是一种“阻碍”：

唐尼 克明现在不是很努力么
一个人变坏容易变好难
你如果真的爱他 难道
应该去阻碍他么？

唐尼和克明身上被作者赋予了个人与集体、私与公、落后与进步等对立意味，唐尼的爱情因此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弱势话语。这样的爱情，不应该是被批判的吗？这样的“消极”爱情叙事，不是只能成为一种从反面来衬托、表现“积极”主题的辅助性内容吗？通过以上对唐尼爱情的分析，不难发现爱情叙事在《火把》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的逻辑所在。

(二)

然而，在具有浓厚主题决定论色彩的研究框架中理解《火把》的爱情叙事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将唐尼的爱情只看作光明、斗争、民主、集体主义等主题叙事的从属性成分，那么它的分量未免太重了——在《火把》的总共十八个诗节中，只有八节正面描写象征着集体力量、民主精神、革命精神的火把游行；而剩下的十节的内容主要是唐尼的爱情，它占据了一多半的篇幅。

另外，《火把》的爱情叙事也并不仅仅具有表现、突出该诗主题的功能。唐尼的爱情之所以会遭到批判，不仅仅因为它“阻碍工作”或者不符合集体主义要求，而且因为它本身的“虚假”性。《火把》第三节“会场”中克明曾对唐尼这样说：“而且/你正忙于交际呢！”这简单的一句话，折射出诗中人物克明以及作者艾青对唐尼情感真实性的质疑。在该诗第十五节“劝二”的末尾，李茵也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唐尼
你是不是真的欢喜他呢？

你欢喜他那样的白脸么？……

艾青在晚年谈起《火把》时曾经这样说道：“在《火把》中写的两个女青年的形象是根据一个青年的经历发挥的。这个女青年，有勇敢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①

如果艾青所说属实，那么李茵对唐尼感情真实与否的疑问其实就是这个原型人物对她自身的拷问，而拷问的结果是：唐尼并不真爱克明。在诗的第十六节中，唐尼曾经这样忏悔：

生活是一张空虚的网
张开着要把我捕捉
所以我渴求着一种友谊
我将为它而感激一生……
我把它看做一辆车子
使我平安地走过
生命的长途
我知道我是错了……

这就是说，唐尼自己都承认了她对克明只有“友谊”。这种友谊不仅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还具有李茵所批判的“现代的恋爱”的性质——“女子把男子看做肉体的顾客”“男子把女子看作欢乐的商店”“是一个异性占有的遁词”“是一个色情的同义语”。这自然是克明和艾青都无法容忍的。

当然，艾青对唐尼“虚假”爱情进行批判不等于全面否定爱情。也正因如此，当壁岩指责艾青有“先革命后恋爱”或“要革命舍恋爱”观念的时候，艾青才能够义正词严地予以回击，指出壁岩不过是像堂·吉珂德把风车当作巨人并举起长矛与之搏斗一样，与一个自己虚构的目标作战罢了。

那么，《火把》仅仅是认定了唐尼感情的“虚假”并因此对其批判吗？也不尽然。

艾青关于唐尼和李茵其实取自同一个原型人物的表述已经可以证明，他

^① 艾青：《谈叙事诗》，《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83页。

对这个原型人物除了批判之外，也是充分肯定的。即便是对唐尼这个从真实的人物中分裂出来以实现诗歌批判功能的形象，艾青也没有表现出彻底决裂的态度。在长诗第一节“邀”中，唐尼说“我要带火把回来”，就已经暗示了这个负面人物的“可挽救性”。另外，《火把》一方面描写了唐尼的虚荣、软弱、自私，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唐尼自己之口说明了她的“天真”与“纯洁”。我们绝不能将这两个词汇仅仅视为诗中人物的自我辩白，实际上，这两个词所在的诗节标题“忏悔”足以说明作者对于人物自述真实性的高度认可。

艾青对唐尼爱情的判断也是充满混乱与矛盾的。在诗中，他一方面展示了对唐尼爱情的怀疑，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的篇幅描摹了唐尼追求克明的行动以及心理，表现了他对唐尼爱情真诚性的信心。唐尼在火炬游行的会场上一直都在寻找克明，即使遭到克明冷冰冰的拒绝，仍然坚持到他家里去（参看第十一节“他不在家”）。如果唐尼对克明的感情是不真诚的，或者说艾青认为这种感情是不真诚的，那么这种描写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从长诗第十二节“一个声音在心里响”能更明显地看出作者展现唐尼感情真诚性的意图。所谓“在心里响”，是唐尼心里所想。艾青在此采用一种全知性的视角，无非是想表示他对唐尼这个人物的了解程度及其确定性。在这一节中，“我举着火把来找你”的句子反复间隔出现，表现了女主人公在爱情中的主动姿态以及“寻找”时的焦灼与饥渴；“我的脸发烫”“我的心发抖”“我要用手指抚摸你的脸 你的发”“我这手指不能抚摸你一次么？”等诗句则描画了唐尼因为爱而彻底抛弃了女性的矜持的心理状态；“我要见你 听你一句话/只一句话：‘爱与不爱’”，不仅是她对男主人公克明模糊与迟疑的爱情态度的诘问，也显示了她遭受爱情折磨时的痛苦。

据艾青说，《火把》中的“一个声音在心里响”那一节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是从《旧约》中《雅歌》里来的。^① 翻检《旧约·雅歌》，其“新妇寻求新郎”一节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

^① 艾青：《谈叙事诗》，《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83页。

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①

《火把》中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当出于此。《雅歌》中的这些句子是女性对丈夫的呼唤，表达的是对丈夫的爱慕之情。艾青的诗句既然来源于此，就可以作为唐尼感情真诚性的旁证——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艾青应该不会用源自《雅歌》的诗句来表现人物的虚假、自私的爱情或者友谊。

如果以上的判断成立，那么我们不难发现《火把》中爱情叙事的复杂性。相对于主题来说，它还具有独立的、更加丰富的意味：诗人一方面在批判唐尼爱情的虚假，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否定了自己的批判；它不仅描摹了诗中人物的爱情症状，而且透露出艾青自己在爱情问题上的混乱、焦灼与自相矛盾。

（三）

《火把》爱情叙事中的混乱和矛盾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艾青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和张竹如、高灏、韦葳之间的复杂感情纠葛。^② 据艾青的好朋友阳太阳说，唐尼和李茵的形象里有桂林某些女性如高灏等人的影子。^③ 程光炜除了认同阳太阳的说法，认为高灏的影子时常出入于诗句之间并深深折磨着艾青之外，还指出，在作品的主要人物唐尼身上也分明深深留下了艾青与韦葳之间生活的痕迹——第十六节“忏悔一”中唐尼的身份、其自述从家乡外出逃难的经历以及年龄等，都令人想到韦葳。^④

程光炜这种从作家的个人生活而不是某种时代话语或者作者对主题的表述出发对于《火把》的解读是极富创见的，然而他的某些具体看法却值得商榷。韦葳在 1996 年 4 月 10 日至 28 日回忆说，她曾在 1939 年冬天萌生过离开艾青投奔新四军的念头。艾青当得知她打算离开自己后，他曾有种被人抛弃的感觉，在屋前池塘边徘徊至深夜，心肝欲裂，极其痛苦。程光炜据此

① 《新旧约全书》，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89 年印发，第 629 页。

② 关于艾青与这三位女性之间的关系，参见程光炜著《艾青传》第六章第六节《婚变风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7 页。

③ 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7—252 页。

④ 同上书，第 279—280 页。

得出结论,《火把》第十二节“一个声音在心里响”中以“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起首的数句诗行“正是他(即艾青)心底迸发出血丝的呐喊”,在诗里,“他(即艾青)不过是借唐尼之口来发泄内心的剧痛而已”^①。

这种理解既和诗中女性求爱、男性接受的逻辑完全颠倒,也和当时韦茨主动追求艾青的事实不符。如果说韦茨当时确实曾经打算离开艾青的话,那么这些诗行似也不可视为他针对韦茨发出的呼喊——韦茨从武汉辗转到桂林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艾青求爱,因此艾青不会对韦茨发出“爱与不爱”的疑问。如果说非要将这句诗视为艾青对爱的质疑与召唤,那么它指向的目标更可能是高颀。

因为诗歌文本具有多义性,它和现实事件、人物之间往往并不是单一、固定的互相指涉关系,所以将某些诗句与某个特定的人物原型相比附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本文对于《火把》第十二节的分析也不敢妄称定论。然而,这样的基本判断仍然可以成立:《火把》中爱情叙事的混乱与矛盾说明,它并非只是该诗主题的一种意蕴明确的从属性成分。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界定《火把》的主题与爱情叙事之间的关系?把后者的矛盾与混乱视为对于前者的偏离或者游移,显然还是从主题决定论出发得出的结论。如果不特别强调主题的统摄性,那么就可以对它们的关系产生新的看法:《火把》的所谓主题不过是作者给爱情的不良症状开出的药方或说是对混乱的爱情进行救赎的方式,即通过对集体主义力量的皈依来解脱爱的困境,使遭受折磨的心灵重归宁静。

这种救赎首先并不是作者艾青的自我救赎,而是对女主人公唐尼的救赎。艾青为唐尼设计的救赎之路是走向大众、走向斗争,并将功利性的、占有性的爱情转化为“同志爱”。在诗中,李茵劝告唐尼说:“爱情并不能医治我们/却只有斗争才把我们救起”,“同志们对我很好 我才知道/世界上有比家属更高的感情”。

然而,所谓艾青对于唐尼的救赎,其实是要唐尼进行自我救赎。在诗里充当唐尼救赎之路引导者的是李茵,而不是那个“正在变好”“工作很努力”^②的男性主人公克明。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艾青关于李茵和唐尼其实

① 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② 艾青:《关于〈火把〉——答壁岩先生的批评(上)》,《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